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一蓑烟雨任平生——复王恩兄	叶上威
【亲历浩劫】	文革中红卫兵向梁思成要钱	林 洙
【难忘岁月】	闻陈小鲁道歉有感	胡果威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7 2 7事件（五）	胡鹏池·但 荣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一蓑烟雨任平生——复王恩兄

· 叶上威 ·

一、我的“家庭出身”

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以其家庭主要成员在解放前三年的职业为依据划定。我父亲解放前三年在国民党成都市政府当秘书，不够“官僚”资格。五十年代初，他申请参加“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拒，理由是他在解放前三年不够国民党县团级官员资格。所以，说我出身“反动官僚阶级”不合实际。我填报“家庭出身”栏目时，填的是“职员”，或“伪职员”。

我家在解放前田无一分、房无片瓦，没有开店办厂，家中没有佣人。说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也不靠谱。手中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人可供雇佣，怎么剥削？

我父亲叶叔明，字书麟（1907—1960），原本是一介书生，在成都大成学堂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校教国文。母亲郭君壹（1909—1983）是成都首批“天足女”（不裹小足的妇女），成都首批职业女性，曾在成都骆公祠小学等学校教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举办过一次科举考试，选拔县长。我父亲考中了，当了三年南溪县县长（1939—1942），并按规定加入了国民党。

解放后，他当过成都市救济分会总干事（全国救济总会主席为时任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市民政局下属的生产教养院院长等小官。

反右运动时，他没有参加，逃过一劫。不过，1958年他患肝病在医院住院治疗时，还是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往峨边县沙坪农场“机关管制劳动”。1960年初，饿死于沙坪。据沙坪农场幸存下来的右派分子回忆，当年那里饿死了很多人，我父亲死得早，还可能是裹张席子挖土埋的，后死的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直接扔沟里了事。

至于我有“杀父之仇”一说，是我班一团支委在找我谈话（当时时兴要“群众”汇报思想）时，按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信口开河之词，混淆了杀、关、管的概念，不宜采信。

我父亲已去世半个多世纪，在他生前我们父子间没有思想交流，我无从判断七十多年前他的思想理念。但是，不论按什么标准，他都算得上是一个清官，一个好官。

古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我这位书生父亲，三年县长卸任，我家不但没见到“雪花银”，连“窝窝”（指住房）也没有捞到一间。我的大哥叶上贤当年已经十一岁了，他还记得，一家人回成都的路费都是找一位姓鲍的人借的。在成都，全家只得到亲戚家借住。后来搬到我外爷家（西城角和宽巷子），一直住到九十年代拆迁。

他当县长时，正值日寇肆虐，两京沦陷，国难当头，他应李庄乡绅的建议，下令拨款建设李庄，收留朔江流亡的故宫国宝文物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国家级学术机关以及许多国宝级学者、科学家。这是一件足可令他的子孙后代永远自豪的事情。

现在，时任南溪县县长叶书麟签署的关于李庄建设和拨给同济大学财政款项等政令仍在李庄博物馆展出。

当年，黄炎培先生到宜宾参观考察，曾高度评价我父亲在李庄抢救国家文物和人才的功绩。解放后，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还致信我父亲，称赞他开发李庄的贡献。可惜此信在文革中被我三哥叶上雄烧毁。三哥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教中学，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恶斗，回成都时余悸犹存，怕被抄家，便把此信和大书法家于右任写给我外爷的一幅大“忍”字条幅等一起化为灰烬。

此外，我父亲还做过一些好事。

如保护、帮助朱德总司令留在南溪的夫人陈玉珍。

解放初，我大约七、八岁时，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两位解放军找我父亲，我父亲不在家，妈妈接待的，一位团长送了我妈妈一百大洋，说是感谢我父亲在南溪时保护、资助朱德总司令的夫人陈妈妈。此事，是我亲眼所见。2016年央视播放的电视剧《朱德传》中，曾有朱德要他当团长的儿子朱琦回四川南溪去看望陈妈妈这一情节，时间、节点正好吻合。送钱应是朱琦从南溪回程时所为。

又如，救助共产党南溪地下县委书记。

1971年，我被作为5·16头子关在川大学生四舍隔离审查。一天，专案组成员、外文系俄语专业段文润老师突然问我：叶书麟是你哪个？我答：是我老汉儿（父亲之意）。他告诉我：我父亲当南溪县长时，他母亲正好是南溪县中学校长、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国民党下令要逮捕她母亲时，是我父亲悄悄通知她逃跑的。民国时期，人们习惯称字而不称名，段老师的母亲只记住了叶书麟这个字，而忘了或并不知道叶叔明这个名。到这时才弄明白。不过，我父亲和他母亲此时均已过世多年。

1980年代初，我的一位表叔告诉我，我父亲的一位好友从台湾回来，希望见我们兄弟一面。大哥和三哥让我去。他叫李天明，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解放前是三青团四川省总干事，在台湾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后在大学教书。这次是应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汝岱邀请回

川探亲访友。他说，1949年他曾劝我父亲去台，我父亲劝他留在大陆，还说了共产党很多好话。得知我父亲死于劳改营时，他老泪纵横，几度哽咽。

他的儿子叫李开复，当过微软亚洲区总裁，还写过几本书，在大陆很有名。

尽管我父亲是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凭考试当了三年国民党县长，尽管他当县长做了那么多好事，共产党还是把他看作另类，直到饿死在峨边沙坪农场。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出身的家庭。

二、文革岁月

◇ 没有谁派我去办川大八·二六驻渝联络站和驻京联络站

文革初期，川大学生时兴在大礼堂辩论，但那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风行全国，上台发言者必先报家庭出身，我非红五类，自惭形秽，不敢上台，索性外出串联。首站去的重庆，住在两路口旁的重庆六中，那里有很多川大学生，我发起成立8·26驻渝联络站，大家居然没有问过我的家庭成份，就选我为负责人。

1967年“二月镇反”时，我在重庆被通缉，同学们掩护我从綦江爬火车逃到北京，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有很多川大学生聚集在那里。一次，大家去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接待站开了一张介绍信，让我们回成都找省公安厅。大家都明白，回去必进班房无疑，只有物理系张晓霖老师一人毅然回去，送她的时候，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受。果然，她一到成都，就被抓进了市大监。此后，北京的风声日渐紧张，不时有成都的公安要到北京逮人的传闻，好些同学都离开北京地院避风去了，那里就只剩下我领着几个同学收集整理成都的消息，通过北京地院东方红战团的渠道报送中央。我也就自然成了川大8·26驻京联络站的实际负责人，没有任命选举。

我虽然是川大最早的几个造反者之一，但是在血统论风行全国的氛围中，不可能有人会或者敢任命我去当川大8·26驻渝或驻京的联络站长。

◇ 死里逃生

1967年1月24日晚，在重庆六中，我和几十名到重庆串联的川大同学都已入睡，突然闯进一伙人抢我们盖的被子、衣物，我和几个同学追出大门，他们把抢的东西扔上一辆卡车正发动汽车要跑，我跳上汽车拦车，不料他们开车就跑，可能驾驶员心慌，也可能是生手，车一下就撞到路边的高压电杆上，电杆断了。我只记得天空中火花乱闪，随即就不醒人事了。我在医院里昏迷了48小时，终于死里逃生被抢救过来，而和我同时跳上汽车拦车的数学系65级同学黎兴举却不幸没有抢救过来，年纪青青就走了。他的尸体被运回川大，埋在学生一舍前面，现已不知去向。他是川大文革中第一批殉难者之一。

1967年“二月镇反”时，我在重庆被通缉，车站、码头都贴着我的通缉令。在同学们的掩护下，我从长江岸边步行到綦江，再扒煤车经桂林、武汉逃到北京。

◇ 和周恩来总理彻夜长谈

1967年3月31日傍晚，我刚在北京地质学院食堂吃过晚饭，突然一辆华沙牌轿车拦住我，一位解放军让我上车，上车后又叫我交出身上带的钥匙和小刀，我心想：这下糟了，肯定要被抓了。不料，车开到人民大会堂，解放军军官说，今天周总理接见你。我才如梦初醒，随他走了进去。原来中央开始解决四川问题了。要听四川的情况汇报，在北京只找到我一个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于是我有幸近距离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大约有十人之多。从晚上8点到次日日凌晨5点，主要是总理问，我回答。其他领导人也不时插话。午夜前，江青来过一会儿，然后拖着声音说，同志们，对不起，我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一共只坐了几分钟。她穿一身军装，看得出是手工缝制的。我当时觉得她有点做戏的味道，不如叶群那样和蔼可亲。会议一完，我就跑到大会堂附近的电报大楼，把消息传回川大，据说立即引起了川大师生的狂欢庆祝。

我一共近十次见到周总理，前三次都是近距离接触，以后参加会议的学生一多，大家都争着发言，而且又开始先报家庭出身，我只得不再吭声。不过我已经汇报的内容有些被采纳了，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议》，即所谓“红十条”中。

也正因为有此机缘，我是最早认识即将出任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川大学生之一。回成都后，我自然成为川大8·26和他们间的主要联络人员之一。

◇ 李红兵及法轮功

李红兵原名李学碧，是外文系英语专业70级学生，也是1966年最早在川大造反的外文系“红心”组的成员。川大八·二六战团成立后，她组建过比八·二六更左的“井冈山野战军”。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并无严格的进出规矩手续，没有八·二六的人把她看成对立面或者异类。我一直把她视若小妹妹，“二月镇反”时她因逃避逮捕，翻墙摔断了腿，到北京是我去火车站接的她，背她到北京地质学院住地的，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领导接见，也是我背她进去的。周恩来总理看见她的腿坏了，要萧华上将安排她去治疗，此后她才渐渐显山露水，成为公众知名人物。

至于她所痴迷的法轮功，我想说几句。我所认识的法轮功成员，多是学历较高、人品善良的人，他们是在对毛泽东的迷信幻灭后信仰空虚，被钻了空子，受骗上当，以至走火入魔的。若措施得当，晓之以理，逐步化解，不至于会有这么大的对立面。当时对法轮功的处置失措，树敌过多，成为后来领导人的一个包袱。

◇ 独立师抢枪事件

1967年5月6日，成都发生132厂（飞机制造厂）开枪打死冲击工厂的工人和中学生事件，5月19日又发生川大师生下乡支农在中和场被包围、殴打、俘虏事件，各派已从相互打口水仗发展到肉体冲突，到冷兵器冲突，再到真枪实弹了。

1967年7月，江青提出了“文功武卫”的口号后，成都川大8·26派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派）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双方都开始使用武器。晚上站在川大原木工房（现清真食堂）就可以听见后面与文化路一路之隔的成都工学院发出的枪声。江海云和我到成都军区去见到张国华政委和梁兴初司令员，要求发枪。张国华政委只说了一句话：野战军的武器你们不能动。我们一时琢磨不透张政委的意思，回校后和游寿兴等人说，大家分析后一致认为是：50军的枪不能动，就只能打独立师的主意，决定由我负责去抢。我找独立师的一位军官画了一幅独立师武器分布的详图，又请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支援了十多辆卡车，按

系分配了各系乘坐的车辆和抢枪的仓库，还请兵团安排人员在我们得手后堵截可能的追兵（结果并无人追赶）。此次行动干净、利落、组织分工井然有序。当然，实际上是拿枪、送枪，不是抢枪。

此后，川大8·26专门成立了5·23部队，下辖一个有十多门高射炮的高炮连，由化学系尹正良总负责。

◇ 《八·二六炮声》总编辑

1967年6月下旬，我从北京回到成都，进了八·二六战团勤务组，没有经过选举，好像是任命的。勤务组分工，让我当宣传部长，兼《八·二六炮声》的总编辑。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发布。我连夜编写出《八·二六炮声》北京版，于5月12日印了二十万份在京发行。报纸全文刊登了中央决定，其余社论和通联报道都是我执笔写的。报纸在北京一度引起轰动，我们的住地西苑宾馆连续三天都有近十万人来声援祝贺。我想，这大概是让我去当总编的原因吧。

《八·二六炮声》编辑部汇聚了不少的川大精英，如中文系研究生项楚，他写过一篇长文“乐在天涯战恶风”刊登在《炮声》上，轰动一时。项楚现在是川大文科的学术领军人物，长江学者。又如历史系研究生袁庭栋，全国著名的巴蜀文化专家、民俗学者，其著述等身，已出版七十余部书籍。再如中文系六八届学生严昭柱，曾任江泽民总书记的秘书、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局局长、太湖文化论坛主席。还有数学系六七届学生席文举，是《华西都市报》的创始人，该报的首任总编，等等。我去后，和大家相处很融洽，我修改的文字，他们还服。不过，我去之前，数学系67届学生梁元弟已经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我去把他挤走，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歉然。

◇ 打李总站不是我的“创意”

1967年下半年开始，四川省、成都市以及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由于家庭出身原因，我没有资格进入，连外文系革委和英语专业62级班革委都没有我的份。

校内不好安排，江海云、游寿兴等八·二六战团主要头头和军宣队就打发我去打李总站接替回校担任校革委常委的历史系学生庞曦，当打李总站的勤务组副组长。打李总站出自何人的创意，确切的创办时间，我全无记忆。

打李总站的全称是“四川省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是成都地区川大八·二六派十六家群众组织的联络机构，十六家组织各派出一人组成勤务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分别派人任正副组长。打李总站设在羊市街成都市委书记楼。我去时，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孙斌是勤务组组长，他正忙于自己工厂（成都机车车辆厂）的夺权，几乎没有到过打李总站，工作实际由我主持。

那时毛泽东主席不时要发表“最高指示”，一有“最高指示”，打李总站就要召开全市大会庆祝。主席台设在原成都的小天安门城楼上（现省展览馆位置，古成都皇城，已拆），大会往往有几十万人参加，我是主持人，颇有点风光。

打李总站的成员单位涵盖了成都各个行业，如空军028部队、省公安厅、市公安局、街道工业、文艺界，等等。我结识了不少朋友。

◇ 川大一号审查对象

我于1962年考入川大，学制五年，毕业后全国统一推迟一年到1968年才分配工作。我又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一时分不出去，许多用人单位一看我的档案就摇头而去。最后，好不容易通过关系找到一家地方国营小厂——成都机床厂收容了我。

我在工厂当加油工，和工人一起很愉快。不料好景不长，1970年春，我正在推着油车给机床加油，一辆吉普车开进工厂，一位军官把我押回了川大，先把我放在外文系批判，不几天就把我单独关到学生四宿舍，军宣队给我的编号是18连1排1班。川大八·二六的一、二号人物江海云、游寿兴才被编为2班、3班，这意味着我的待遇升级了，我成了一号审查对象。

这次被关押一年多，我感觉最难受的还不是挨批判，而是每晚通宵都开着一百瓦的灯照着我，怕我自杀。原来是我的两位好友、物理系刘成兴和陈永前相继自杀死了。我再三保证不会寻死，但无济于事。好在那时年青，后来也慢慢习惯了。

事后我才弄清楚，我之所以成为一号审查对象，是因为军宣队收到揭发，以为我是四川省的“五·一六兵团”总头目。其实，我那时连五·一六兵团几个字听都没有听说过，也太荒唐了！

这次关押，我也有自得之时：每天食堂送饭来，我碗里的肉总比专案组的多，原来送饭的冯师傅是个铁杆八·二六，和我熟悉，专案组拿他无可奈何，毕竟他只是一名普通工人。

◇ 人造金刚石钻头

林彪出事后，我被解除了审查。当时我已联系好，准备去峨嵋电影厂搞创作。川大老校长温建平却希望我留在学校，协助他抓物理系固体专业搞的“超硬材料”研究项目。我却不过情，留下了。

物理系张兴栋几位老师用石墨研制的超硬材料，理论上可以取代金刚石作石油钻头，但当时川大一无钱二无设备，无法研究下去。我通过关系到北京石油部副部长唐克家中汇报，争取到石油部的经费支持。制造人造金刚石的压机需用进口钢板，国内只有自贡东方锅炉厂有这种捷克进口的钢板。我到自贡找到已经任该厂政治部副主任的川大无线电系62届同学袁德森，他在《八·二六炮声》编辑部呆过，和我很熟，通过他的努力，东方锅炉厂无偿赠送了上百吨这种钢板给川大。压机制成后，人造金刚石也制造出来，由四川石油机修厂加工成钻头，先后在威远、广安等地的油气井试钻，钻下了五千米以上的超深井。试钻时，我都守在现场。我通过新华社四川分社和四川日报，写内参上报，得到毛泽东、华国锋两位主席的圈阅。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四川省委授予该项目组“和四人帮对着干的先进集体”。

我全副身心投入这个项目，花了三年多的时光，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可是，“先进集体”的荣光却一点也没有洒落到我的头上，太不公平！阶级斗争时代，何处去谈公平啊！1977年，学校“揭、批、查”运动专案组对我做出审查结论：在文革中“犯严重政治错误”。

我投身文革，有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因素，毕竟是狼奶养大的狼孩子，从小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种下了乌托邦的激进革命理想基因；当然也有年轻人想自我表现的原因：文革给我

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我长期因家庭出身原因备感抑郁、不平的心灵终于有了释放、表现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记得读大学四年级时，一天，全校师生集合去街上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我被告之：政审不合格，不能参加。那天，学生四食堂就我一个人吃饭，诸大个校园一改往日的喧闹，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我孤零零地徘徊在荷花池畔，心中塞满悲怆。通过这件事就不难理解，当我突然遇到平等机会时，会产生怎样的兴奋乃至爆发了。

文革中，我没有辱骂、批斗过一位老师、一位干部，没有打砸抢过，更没有去抄过家。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极致表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实践一种没有货币、没有商品经济、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的乌托邦社会。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就是他这种思想的实验田。他失败了。

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后果是中国人民从他的思想桎梏中、从对他的迷信崇拜中解放出来，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把他自己的神龛砸翻了。但是，中国人的信仰也开始幻灭了。

回过头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五四也好，六四也好，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愤青色彩，不宜宣扬肯定。

三、教书生涯

文革结束后，我回到外文系，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开始教书生涯。系上无论领导还是教师，没有一个人歧视、冷落、刁难我。我有回家的温暖感觉。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解毓葵先生让我迅速适应了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点拨我教学中的问题，鼓励我探索新的知识。当时全国各名牌大学的英语专业都分配了翻译联合国文件的任务，解先生主持翻译的文件被评为全国高校最优，因而在全国翻译界享有盛誉。他让我去教英国史和美国史，接替历史系杨宗绪和顾学稼老师回历史系出国、外文系这两门课无人教的空缺，还支持、鼓励我参加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的《世界历史词典》一书。后因我翻译的文字质量较高，商务印书馆让我负责全书英国内容词条的审定，此事历尽我七个寒暑，经常熬夜至凌晨四、五点钟，对我知识积淀作用甚大。

1979年4月，解先生去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参加教育部主持的“翻译课教材审定会议”，把我也带去了。会上，全国英语界的名流不少，洛阳外院的张云基教授曾请人专程去买了跳龙门的黄河鲤鱼，设家宴招待解先生和我。张云基先生原是国民党驻联合国的翻译，解放后关在死牢中，萧华上将任洛阳外院院长兼政委时，下令把他从狱中放出，安排他当上了副军级的英语教授。洛阳一行，令我眼界大开。解先生正值英年，本来还可以在学术上继续施展，却不幸患肺癌于1982年去世。

痛失恩师，我十分悲伤，是他指导我开始教书生涯，指引我走上了做学问的道路。

我在川大外文系英语专业，先后教过精读（许国璋教材）、泛读、翻译、英语写作、英国史、美国史，中国文化概况（自编自写英语教材）等课程。在当时全国各高校外文系英语专业的教师中，教授课程门类之多、跨越幅度之大，恐怕无出我右者。

1988年初，系上派我带一百多名学生去西藏实习，不料一到拉萨，就遇到骚乱。原来指望学生到西藏给外国游客当翻译，这一骚乱，外国人到西藏旅游就签不到证，我们这一

百多号人就无事可做，虽然食、宿和机票的费用都由西藏旅游公司负担，但学生们的安全很快出现问题。当时一些混混经常和学生发生冲突。西藏武警总队政委陈华全将军在成都时我就认识，危急时候他派了一个排到我们驻地保护学生达五天五夜。我进藏前请四川省军区高树椿政委（文革时川大军宣队负责人）给西藏军区的司令、政委写了一封拜托帮助的信，西藏军区派车送我们去圣湖羊卓雍措、哲蚌寺、色拉寺、罗布林卡等地游览。我忙于联络、安排、应酬各种事宜，连布达拉宫也没有随学生进去。军区一些中下级军官对我们几位老师很热情，经常请客，我尽管酒量很大，可以喝一斤白酒，但仍然经常是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不是对手。我那时才体味到唐人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一诗中戍边将士的情怀。

半年后，我和金纪昌、林京等老师终于将一百多名学生平安带回成都。但我却累病了，患了类风湿关节炎，手、足关节变形。我家住四楼，上下楼都要人抬。

扪心自问，无论课堂教学还是带学生实习，我是对得起培养我成长的川大外文系的。但是学校对我却很不公正。我多次申报副教授职称，学科组都通过了，都被学校领导以“文革有问题”为由驳回。九十年代初，川大曾颁布了一项土政策，老五届的毕业生一律升副教授，连八·二六团长游寿兴都升了，我还是被校长以莫须有的罪名否决。我的教授头衔，是退休后学校反聘发的，不和工资挂钩。我现在的退休金仍是按讲师级别发的。

四、下海经商

我下海经商，直接原因是职称问题。时任川大副校长的数学系刘应明私下对我说：“你的职称，学科组通过了好几次，报到学校，次次都被林校长打回，看来，你在川大难活出来啊！”职称，对一个知识份子而言，意味着工资住房待遇，是对他的工作业绩的肯定，对他的学术地位的认同，是他的名誉声望和面子所系。对川大，我有点心寒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所在的英语专业教研室的教师都第三轮公派出国留学进修了，唯独没有我的份。我私人联系的美国加州大学带奖学金的留学邀请也被学校拒绝。一个外语系教英语的，连英语的母语国都不准去，实在憋屈。而且，学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些坐牢出来的造反派头头靠倒服装、卖纽扣，开饭馆，搞建筑，都纷纷发财了，我也有些眼红心动。几个因素叠加，就下决心下海了。

下海，我具有很多优势：我的人脉关系广，上层公关协调能力强，长于策划宣传。

我先办了家科技咨询公司，搞科技成果转化，启动资金二万元，由好友丘先甫赞助。第一个着手的项目是物理系周鹏程老师发明的开关电源。我花三千元从周老师手上买下专利技术，请无线电系的老师做成实物，自己带着电源，跑了几十趟绵阳，历时近一年，试图打入长虹电视机厂，结果，牛皮哄哄的长虹厂派了个测试工就把我打发了。之后我又去搞建筑，凭着人脉关系，办了家可修建七层以下楼房资质的建筑公司，还揽了一项大工程。我不懂建筑，就把项目交给我很信任的一位中八·二六和她当包工头的老公，约定利润三七分，我得七成。不料第一栋楼建成结算：亏损。他们赚得钵满盆溢，我却颗粒未收。我不懂财务，明知上当，还打不出喷嚏。我的兄弟伙、和我一道下海的物理系教师蒲贤安说我不懂经营，劝我把建筑公司交给他，我去办学，他每月给我发工资，公司赚的钱五成归我办学用。我那时刚想办民营大学，就同意了。将公司的法人代表换成他。不料，我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他就翻脸不认，把我从公司的工资花名册上除名了。多年的朋友从此成为路人。

那时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消息：安徽省政府批准成立全国第一家民办大学，江淮大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任名誉校长。我通过川大数学系姚志坚教授等的引荐，到北京拜会了费孝通，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胖胖的，笑起来像尊弥勒佛。费老给安徽一位副省长写了封信，我又到合肥找到这位副省长和江淮大学的校长，比较顺利地办妥了在成都开办江淮大学华阳分校的手续。但是，在成都办学还得成都市教育局批准，按照成都市教育局的规定，办大学必须有师资（需教师身份证和职称证），有教室，有运动场，有藏书多少万册以上的图书馆。我从川大和其他学校找了几位退休教授，又签了几份场地租赁合同，达到了市教育局对师资、教室和运动场的要求，唯独图书馆这事没有办法，找了很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过不去这一关，最后不得不搁浅下来。

正在我东不成，西不就，无所适从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条消息：西北轻工业学院一位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提案建议用酸水解法生产酱油，卫生部明确答复说，这是我国酱油生产发展的方向。该学院要转让这个技术。我立即让我的妻子周育红去咸阳，用两千元买下这项实验室技术。周育红是川大生物系六三届学生，毕业后一直在制药厂工作，当过厂技术科长和新药车间主任，因为从事有毒有害工种，工龄一年按一年半计算，我动员她到点退休，去自己办厂，她同意了。我们在大邑县开办了“成都味极鲜调味品厂”。她买的是实验室技术，她以此技术思路为基础，设计出生产工艺流程、设备和原料配方，在工厂工业化生产一次试车成功。产品经县、市和国家三级质检机构测定，不含细菌，不含黄曲霉毒素（当时国家标准规定，每毫升酱油细菌总数含量五万以下、黄曲霉毒素5微克为合格），我女儿叶莺提议叫“灶王酱油”。工厂由大邑县乡镇企业局出资，后改为由省财政厅和四川省人寿保险公司投资，周育红出技术任法人代表，管生产，我当董事长，管营销。这个企业的起步阶段，势头、条件都相当好，但是项目设计理想化，显得过于时髦超前，阳春白雪，且产品单一，难调众口。酱油本是大众日常生活必需品，可是每市斤灶王酱油的原料成本就要一元多，不符合当时大多数正在脱贫的国民的收入水平，而市面上用工业废水勾兑的酱油售价才两叁毛钱，产品几度滞销，最后不得不因资金链中断停产。

办厂期间，周育红长年住在工厂。大邑盛产青梅，闲时她买些梅子做梅果、梅醋、梅酒吃，一次，市计委的领导来厂考察，尝了自酿的梅果梅酒梅醋，赞不绝口，认为很有市场前景。周育红将该技术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又将处于半停产状态的企业更名为成都梅岭饮料酒业公司，改产青梅酒。我还请轻工业部四川设计院设计了一本在大邑县退耕还林三万亩种植梅树，生产青梅酒等系列梅产品的农业产业化报告，上报国家计委，争取国家资金支持。这个项目被列为成都市头号农业产业化项目，据市计委几位处长透露，项目很可能获批，国家至少可给2亿元，但企业必需有1亿元自有资金。我正穷得叮当响，哪来这1亿元！市上建议我找企业拼凑，我使净浑身解数也没有办法凑够，最后，只好看到稀饭化成水，两亿元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由于资金不足，青梅酒销路没有打开，几经周折，后来四川宏泰公司出资控股，我才得以脱身。

记得刚下海时，灶王酱油这个产品曾受到广泛关注，1993年3月8日，《成都日报》为纪念三八节，用一整版刊登了十个先进妇女的照片，周育红的头像也居于其中，她就成为了当年所谓的成都市十大女强人之一。国家“星火计划”将“灶王酱油”项目列入，并下达文件，给工厂500万农业银行贷款指标，结果到了大邑县农行，我们分文没有贷到，指标也被拐到另外的地方。我不善经商，又没有按潜规则行事，能全身而退，实属万幸。我的下海生涯，可以用一首台湾歌曲的两句词概括：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何只是空空的行囊，可以说是遍体鳞伤！我多次站在法院的被告席上，几度被讨债人堵

在家门口出不去，饱受欺骗、屈辱、伤害、背叛等多重磨难。不过，我也不断得到真诚的帮助，结识了一些好友。可以说，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

下海期间，我圆了一个梦：出国。在川大，一提到出国，就卡在政审关的文革表现上，拿不到护照。在大邑，我办了公务护照，先后去过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

我在办厂期间，还在大邑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支持下办起了鹤鸣山、雾中山开发区。我在川大编写中国文化概况教材时曾请教国家级宗教研究权威、川大宗教研究所所长卿希泰先生，他告诉我，中国道教发源于大邑县鹤鸣山，不是青城山；南方丝绸之路派学者认为，佛教是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摩腾、竺法兰两位印度高僧先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大邑县雾中山结庐为庵，两年后，他们在洛阳修好白马寺，又回到雾中山建的开化寺。鹤鸣山和雾中山仅相距七公里，明代学者杨陞庵曾勒碑“仙佛同源”，肯定两山的历史地位。开发区由一位县委副书记牵头，我实际主持工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请川大宗教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大邑县联合召开世界道教研讨会。台湾中华道教协会会长看到鹤鸣山道观的破败情况，郑重表示，愿回台湾募捐三亿人民币重建鹤鸣山。大邑县政府将此事报告给四川省政府，得到肯定，又按规定上报国务院（中央规定，海外宗教捐款，百万以内由所在省审批，百万以上的由国务院授权国家宗教局审批），也得到批准。说来也怪，一千多年前，江苏丰县人张陵万里跋涉，来到四川大邑县鹤鸣山这个羌藏汉多民族出沒的蛮荒之地，创建了道教，而这个创教的山洞内居然具有防潮、防热、防磁、防震、防辐射等功能，五十年代被中央军委选定为国家度量衡基准库，一直由一个连的部队把守。我请川大艺术学院和川大宗教研究所的几位老师，带着十多名学生到山中住了两个多月，勘察、测绘、设计出“两山开发规划（图和模型）”。只待资金到位就开工建设。但是，要开发鹤鸣山，部队就得撤出山洞，经过逐级上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批示，支持鹤鸣山开发，同意部队撤离。但需二亿元撤离费用。批文没有说这两亿元钱从何来，成都市委统战部和大邑县委都不知道从哪里去找这笔钱。而且，这时台海风云突变，1996年，李登辉公开叫嚣台独，一度缓和的两岸关系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民间来往也黯然失声，台湾道协捐款一事从此没有下文。功亏一篑，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两山开发规划只是几页废纸，也只能偃旗息鼓，搁置下来。

我下海十余载，最后黯然退场。本是个教书先生，不是办企业经商的料，但梦醒时分，课堂已回不去了。因为我在1995年五十二岁时，已经因病（类风湿性关节炎）提前从川大退休。

五、回归书斋

1999年12月31日傍晚，新世纪来临之际，我独自漫步至府河和沙河交汇处，四周万籁俱寂，空无人迹，望着脚下潺潺流水，胸中塞满惆怅，不知什么原因，口中突然冒出柳宗元的绝句《江雪》反复吟颂：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千古共鸣，我是柳宗元的知音啊！我就是那个独钓寒江的蓑笠翁啊！

2004年9月，我患鼻咽癌做放化疗，化疗后打嗝，昼夜不停，无法进食，四川肿瘤医院邀请华西医院、四川省医院、陆军总医院、中医学院的专家会诊治疗，都毫无起色。到第八天，人快支撑不住了，这时奇迹出现：我的好友张成大外出回到成都，在医院用针灸几针就把我救活了。

是年年三十夜，我写了一首七绝“甲申年除夕有感”：

江海弄潮几浮沉，绝症无奈骨铮铮。
我有书斋归未得，窗外忽闻爆竹声。

我在书斋中带病延年的生涯从此开始。

我在川大外文系先后教过英国史、美国史和中国文化史（用英语自编教材），翻译出版了《文幼章传》，翻译《世界历史词典》的部分内容，并受商务印书馆委托，审校该词典中英国史内容的译文，历时七个寒暑，经常熬夜至凌晨。这部耗费了我壮岁巨大精力的辞典虽然至今未能出版，但是，正因为这些经历，我的知识广度和深度都得以积淀、升华。

我从过去教书时曾思考过的一些课题中梳理、筛选了三项重新研究，即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原因、英国光荣革命后的信仰危机、种豆得瓜，相反相成论异化。

对第一个课题中西文化的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前辈学者如胡适、季羨林等都有明确论述，但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则语焉不详，我从对比研究中总结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在于东西方的遗产（主要是土地）的继承制不同，写出了《从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历史看两种文化的不同表达特色及其原因探索》。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方立克先生等学术界泰斗的肯定和认同，决定让我在国家级文化论坛——太湖文化论坛2011年5月18日首届年会上代表中国文化学者和外国文化学者对话，我的对手原来邀请的是美国学者、《第三次浪潮》作者阿尔文·托夫勒，他临时因抗议艾未未事件而没有出席，改为由捷克社会科学所所长接替。

太湖论坛标志着我人生中又踏上一级台阶。

现在我已开始写英国历史上的信仰危机一文。

◆ 结语

我去年三月满了七十三岁。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看来，我已跨过了七十三这一坎，正向八十四那一关走去。我相信，到那时，我也会爬过坡坎，走向百岁的。

我的人生旅程可以说十分坎坷崎岖。大讲阶级斗争、大讲家庭出身时期，我是“黑五类”下等贱民，处处低人一等；改革开放后，不提阶级斗争了，我又被扣上“帮派份子”帽子，受到诸多限制歧视。一路走来，荆棘丛生。行路难啊！政治上我从未享受过平等待遇，人生不如意事七八九，我是深得个中三味的。不过，我也不断遇高人相助，不时沾阳光雨露，不时也有惬意之举，春风得意之事。到了六十岁，该颐养天年了，却被疾病缠身，先是2004年患鼻咽癌，到了2008年又是许多我第一次听到名称的恶疾：肺动脉高压、双肺纤维化、干燥综合症，等等。2014年又突然患腹膜炎，经抢救手术后，元气大伤，双耳全聋，戴助听器也不管用，交流靠笔写，走路靠轮椅、拐杖。不过，我没有倒下。遵照一位老医生“带病延年”的教诲，坚持锻炼，从扶着轮椅学步开始，点滴为进，久久为功，现在不仅扔掉了轮椅拐杖，每天可以慢步行走半个多小时，而且告别了无声世界，戴上助听器可以交流了。

世事沧桑，往事并不如烟。学术上，我也在不断探索，不时会发些微言于世的。

积跬步，以至千里。我正徐徐前行。

2017年2月25日于三亚

~~~~~  
【亲历浩劫】

文革中红卫兵向梁思成要钱

• 林 洙 •

（编者注：林洙是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陪伴梁思成经历文革磨难。）

群众逐渐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思成是头号反动权威，不管哪一派都要揪斗他，往往一“坐飞机”就是三四个小时，或是大半夜。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认为这是学生们不再打内战，开始听毛主席的话，搞“斗批改”了。他以为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快得到解答了。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他的健康明显地恶化了。在一次批斗会后，他的身体彻底地垮了。那是一次批斗系总支书记刘小石的会。主攻对象是刘小石，梁思成只是陪斗。

在批斗会进行到一半时，很受思成器重与爱护的一个学生走上了讲台，他自称早在“文革”前夕就收集整理了梁思成的反党言论上报党委。他揭发批判刘小石，说在他们整理的梁思成的材料中，刘小石把一些关键的“反动”言论给删去，包庇了“反动权威”。那天晚上我扶思成上床时，发现他极度的虚弱，还有些颤抖。他喃喃地说：“没有想到啊！真没有想到啊！”

在“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的一个“徒弟”由于对运动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时，他就常常对我说：“我真后悔找了几个年轻人来当助手，原想把我的学识更好地传授给他们，没想到反而害了他们。梁思成的大弟子这个臭名，他们要背一辈子，我对不起他们，我真后悔！”“文革”不久，高干医疗制度就取消了，清华校医院又因他的医疗关系不在清华而拒绝给他看病。不得已，我只好带他到北医三院去。我永远感谢给他看病的陈世吉大夫，当他看到病历上“梁思成”三个字时，并没有像有的人那样蔑视他，而是低声地向他的助手说：“他是一位建筑学家，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他仔细给思成检查，并找了几位大夫来会诊。

整整一个上午，我看他们反复地听着量着，看着各项检查的结果，低声地议论着。我紧张到了极点。最后，陈大夫把我找到一边轻轻地说：“他患的是心力衰竭，很危险。你能设法让他住院吗？”“住院？”我愣住了，紧紧地咬住哆嗦的嘴唇。陈大夫会意地点头说：“这样吧，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后你不要再带他来了，他必须卧床。”

当他知道我们家里有血压表、听筒和注射器时很高兴，要我每天给思成量血压、数脉搏，作好记录，定期来取药，他还详细地告诉我那些药的服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他特别叮咛我千万要防止思成感冒。从此，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保姆、理发师，又多了一项职务护士。这样我一直保持着和北医三院几位大夫的联系，直到1968年11月周总理直接过问了思成的情况，才把他送进北京医院。

1967年清华的“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限三天内全家搬到北院一间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中去（这是我们1966年以来第三次搬家）。1967年2月，寒冬还没有过去，我去看了那间房子，一进门就让我寒而不栗。阴暗潮湿的房间，因为一冬没有住人，墙上、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这对思成的健康将造成致命的后果。我们又一次卖掉“多余”的家具。最苦恼的是大量的书怎么办呢？我们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整理，这些书过去我没有时间细看，很多外文书，我更是看不懂，现在要决定弃留就必须认真地挑选。在清理图书的时候，在书架上翻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的大封套，打开一看，呀！全是一些精美的塑像和小雕塑品的图片，这是思成多年研究雕塑史收集的资料。

我们暂停了书籍的整理，坐下来欣赏这些图片，有一对汉代铜虎的图片吸引了我的注意，铜虎栩栩如生，它的头、身、尾、爪没有一处不显示出力量的美。思成拿在手上赞叹不已，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你看看，眉，你看看多”“美”字刚要脱口而出，忽然想起这是当前犯忌讳的词，于是立刻改口说，“多多么有毒啊！”我们不禁相视大笑起来，这是我们“文革”以来第一次欢笑。1987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佛格博物馆亲眼见到了这一对珍品。我的耳边又响起思成的赞语。“你看看，眉，你看看多多么有毒啊！”

我把一部分贵重的建筑书刊整理出来，请求暂存在建筑系资料室。“文革”小组的那个人瞪起眼珠怒视着我说：“把资料室当成你们家的仓库？不行！”“那么我把书卖掉，请你在申请表上签字，以后别说是我销毁了批判材料。”我说。他气极了，但只好一挥手表：“先放着吧。”武斗期间系馆成了据点，这些书被撕毁并丢失了大部分，所余无几，后来我把它们送给了系图书室。其他的书，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废品收购站。

为了准备答复红卫兵可能提出的质问，当晚我在笔记本中作了这样的记录：“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车拉了一整天，共运45车次，计售人民币35元。”我把一间小厨房收拾出来给老太太住，但是我和思成及两个孩子（已是大男大女）怎样安排在这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是个难题。我拿着房间平面图及按同一比例尺制成的必不可少的几件家具的纸片，在图上摆来摆去，怎样也安排不下。这时思成的建筑师才能得到了最后一次发挥，他很快地用书架柜子组成了隔墙，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的“卧室”；还有一个供他写检查的书桌；然后是男孩、女孩的安排。小小24平方米奇迹般地出现了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小规划”。

我们搬进北院的当天，突然来了寒流，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虽然炉子一直燃着，但室温还是处于摄氏零度左右。正在这时，“砰，哗啦”！“砰，哗啦”！连续数声，窗上的玻璃一块块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们在大风中急忙糊上报纸，但怎样也贴不住，浆糊一抹上很快就冻成冰了。室内温度急剧下降，零下2摄氏度、零下3摄氏度、零下5摄氏度。我们奋战了两小时，在风势略小时糊上了纸。我彻夜未眠，不停地往炉子里加煤，并为思成不断地更换热水袋，但他还是感冒了。这样的“游戏”，后来隔几天就发生一次，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仍在顽强地同疾病搏斗着。

清华两派的对抗，已经发展到了武斗、你死我活的地步。中央曾告诫两派的头头们如果不停止武斗，就停发全校员工的工资。但武斗仍未停止，于是全校停发了工资。一天晚上，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后，闯进来四五个戴着“井冈山”红袖箍的彪形大汉，他们自称是“井冈山”总部的人，带着手枪和匕首，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他们把我推向一边，直冲思成而去，为首的一个指着思成问：“现在全清华的革命群众都在挨饿，你知不知道？”“我听说停发工资了。”思成说。“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是看你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我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我们的家务是林洙管，我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钱。”“放屁！你没有钱，谁有

钱？你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全是人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现在你哭他妈的什么穷？你对革命群众是什么感情！”他抬起手给了思成一个耳光。思成晃了一下几乎摔倒，我冲过去扶住了他。这伙人进来时我吓得要命，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等定了定神听明白他们的来意，注意到他们中有一个人，始终把在门口张望。我觉得他们不像好人，因为我们系“井冈山”的头头已经在前一天找过我，要我们捐钱为低工资的职工发一定生活费。由于思成的工资早已停发，存款也已没收，我手边仅仅余下每次搬家卖家具的二百多元，我把它上交了。我断定这几个不是好人。我想起“邪不压正”这句话，它给了我胆量，于是我对他们说：“我们系井冈山的负责人昨天来过了，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了，隔壁的老刘可以做证。”“你们要是没有现金，其他东西也可以。现在有些人家都揭不开锅了，你们知道吗？现在是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这是考验你们的阶级感情。”真不知道当时我从哪儿来的胆子，竟敢对着他们说：“我不信，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怎么会饿死人，你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据我所知井冈山和414总部（“文革”时期清华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他们已经在设法解决群众的困难。再说北京市革委会、党中央更不会不关心清华。梁思成早就没有工资了，存款也没收了，你们既然是总部的，难道不了解这些情况？我没有任何金银首饰，所有值钱的东西早在抄家时抄走了，不信你们搜好了。你们是总部的人，为什么白天不来，晚上来？”我的话大大地激怒了他们，其中一人举起手中的皮鞭开始抽打我。

这时思成忽然猛扑过来说：“你们不能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只见他脸色发青，呼吸困难，连连喘气。我拼命地大喊：“救命！救命！打死人了！”这几个人慌了，冲我说：“好！你不是说我们白天不敢来么？明天中午十二点你等着我们。”于是匆匆地走了。后来我听说那几天晚上，很多教授都遭到经济上的勒索。

第二天早上，天空阴沉沉的，不久就下起瓢泼大雨。我带着恐慌的心情，等待着昨夜的几个歹徒，思成坚决要我离开家里，由他一个人来对付他们，我自然明白他的考虑，我也就更加一步也不肯离开他。到了黄昏时分，我更加紧张了，思成的身体是绝对经不起再次的折腾了。我决心冒雨到中关村去找小妹妹的爱人，求他来陪我们过一夜。这天清华已被几万名“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团团围住。我离校门还有二三十米的地方，就看见十几名工宣队的队员把住校门，在严格地盘查出入的人员，于是我又折回家来。雨下得更大了，这一天是1968年7月27日。

□ 摘自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

【难忘岁月】

闻陈小鲁道歉有感

• 胡果威 •

据《人物》报道，陈小鲁公开致歉一事尽管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但是陈小鲁的朋友郝新平则表示，自己的另一位红二代朋友“很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说“陈小鲁不像话”。

作为文革的过来之人，我亲眼见过红卫兵殴打老师和同学的暴行，而且我自己也曾遭到红卫兵的毒打。陈小鲁向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师道歉，触动了藏在我心底的创伤。

1966年我在上海的五十四中学读高一。五十四中学在康平路和吴兴路口，是上海法租界好房子最集中的地方。当时我家住在建国西路吴兴路口，离学校两条马路，往北走一条马路便是梧桐树成荫的衡山路，过了衡山路左手是挪威王国领事馆，右手是荣（毅仁）家的房子和捷克斯洛伐克领事馆，下一个路口便是康平路。在吴兴路西侧，康平路的路南是荣毅仁家，路北的康平路100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宿舍大院，再往西便是康平路165号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俗称“康办”。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五十四中学有许多干部子女，还有许多资本家、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的子女。

1966年文革初期，学校的红卫兵开始斗老师，一开始还算文明，只是写大字报“口诛笔伐”。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不点名地提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为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其名，答曰：“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彬吗？”答曰“是”。毛说：“要武嘛”，宋彬彬此后即改名为钦赐的“宋要武”，全国范围的武斗也开始了。

当时被红卫兵打得最惨的老师有屈南松（右派）、沈天石（历史反革命）和伏文彦（张大千弟子）。语文老师张潜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吞金自杀未遂。我的班主任卢忠健是富家子弟，喜欢玩照相和装收音机，被打倒了。邻班的班主任陈吉贤喜欢到“老大昌”喝咖啡吃蛋糕，也被打倒了。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所有中年以上的老师，因为他们曾经在“旧社会”生活过，都因各种罪名被打倒或靠边。只有家庭成分好的年轻教师除外，因为他们年轻而不可能有历史问题。

武斗的方法很多，除了打嘴巴子、拳打脚踢、用武装带抽之外，还有让“牛鬼蛇神”们互相抽耳光，剃光头和阴阳头，泼墨汁和红墨水，在烈日下跪着请罪，挂牌子，两个红卫兵各擒一臂的“喷气式”批斗等。还算好，五十四中学的老师没有被斗死的。

当时的学生分为三大派，一派是“红联战”，主要由干部子女组成，另一派是“五十四公社”，主要由工农子女组成，这两派是冤家对头，一句话不对便大打出手。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没有参加红卫兵，属于中立的“逍遥派”，即“你搞你的路线斗争，我搞我的线路斗争”，男的搞天线、地线（装矿石收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女的做针线、织毛线。我哥哥从小在上海小学寄宿，因为是贵族学校，接触的同学非富即贵，故有鸿鹄之志，参加了“五十四公社”，常常几个月不回家吃饭睡觉。

因为五十四中学的干部子女特别多，其武斗的规模也是上海闻名。1967年10月12日，听说“红联战”向“五十四公社”发动全面进攻，我赶紧跑到学校。只见几百个穿褪色军装的干部子女，有的是本校的，有的来自临近的学校，把整幢校舍包围得水泄不通，公社派被困在楼里。“红联战”不断地往上冲，“五十四公社”将三个楼梯口都用课桌椅堵住，并往下扔东西。我躲在一棵树后面，只见砖头和瓦片从楼上的窗口里如下雨般地飞出来，打伤了好几个“红联战”和看热闹的人。“红联战”则用弹弓，气枪和自制的火器进攻。他们居然还搞到一辆带云梯的消防车，开到武斗现场，但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才没用上。

双方对峙一整天之后，傍晚“红联战”的人开始散了，但是学校周围还是有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我为哥哥的安全担心，于是就绕到学校的后面。那儿看热闹的人少，趁他们都在往上看，我在暮色的掩护下偷偷地溜进了大楼。楼梯上都是横七竖八的课桌椅，我清出一条通道往上爬。当我接近四楼时，上面听见响声，开始往下扔砖头和瓦片。我挥着白手绢轻轻地说：“是我，胡果文的阿弟。”他们把我拽上去。我告诉他们进攻的人多数已经走了，应该

可以突围了。他们一个个悄悄地爬下去，在三楼的楼梯口集合。等每个人都下去之后，好几十个人（包括我们哥俩）一起飞快地冲下楼去。马路上还剩下一些“红联战”的死硬分子完全没有准备，他们褪色的军装很容易辨认。我亲眼看见公社派的人冲上去，把“红联战”的好几个头给打开了，血直往外喷。然后公社派就在夜幕下飞快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为“五十四公社”通风报信的消息，不知道怎么被“红联战”知道了。1968年夏天，工宣队进驻学校，所有的学生都被召集到学校欢迎工宣队。欢迎会开到一半，我内急去上厕所，在走廊里被“红联战”堵住，十几个红卫兵围着我拳脚如雨点，大约一分钟完事后呼啸而去，我已是头破血流。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凡是尚未分配工作的老三届毕业生，都得上山下乡，谓“一片红”。因为班主任卢忠健被打倒，校“革委会”派了一位年轻教师负责分配我们上山下乡。新的班主任叫李思明，贫农出身，本人党员。

我们班的红卫兵绝大多数是“五十四公社”派，他们十几个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所以下乡也要在一起。当时可供选择的地方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云南、贵州、江西和安徽。

黑龙江有军垦和国营农场，有固定工资，而且在反修最前线，云南则有神秘的西双版纳，在动员下乡的宣传材料中被描绘成“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的仙境，这两个地方是“五十四公社”的首选。至于究竟是去黑龙江还是云南？他们中间还是有分歧，所以他们便将所有黑龙江和云南的名额都先霸占下来，最后决定都去黑龙江或是都去云南，再把不用的云南或黑龙江名额吐出来。

在所有的选择中，我只是在昆明有个姨妈。为了有照应，我希望去云南。因为我哥哥是“五十四公社”的骨干，我让他跟我们班的“五十四公社”成员陈情。因为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我的要求被一口回绝，“没门”。新班主任李思明不同意他们那种霸道的做法，答应优先考虑我去云南，并把我的名字写在他笔记本里的“云南”那一页。当时李老师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班上的那些红卫兵将他的抽屉撬开，偷走了他的笔记本，发现了分配方案。

1969年1月初，“五十四公社”通知全班同学到校开会讨论分配的事情，大家入座后等李老师来主持会议。李老师刚进教室，躲在门后的红卫兵将教室门关上，其他十几个红卫兵便一拥而上，将李老师暴打一顿。李老师口鼻流血，衣服也撕破了。其中一个红卫兵晃着李老师的笔记本说，“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告诉大家，所有的黑龙江和云南名额都是我们的，谁也别想，等我们挑完了再说。”

既然云南去不了，别的地方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因为吉林冰天雪地，吃粗粮，而且是插队落户，没有工资靠天吃饭，没人愿意去。反正都是无亲无故，我便胡乱选了到吉林。

2006年在上海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李思明老师来了，当年下手最狠打他的同学也来了。席间那位同学根本不提旧事，谈笑风生，好像没事人似的。会后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议论，他怎么连一个“对不起”都没有？

1966年6月，毛泽东曾就打人做过指示：“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从宽恕的角度来看，当年的红卫兵，因为少不更事，很容易受极左思潮的蒙蔽。若是打老师，因为老师是阶级敌人，打老师是出于阶级仇恨，符合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的逻辑。若是两派之间武斗，武斗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派，是捍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可以用毛泽东“好人打好人误会”来解释。

至于上山下乡，所有的知识青年都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因为是红卫兵，便自以为高人一等，下乡还要挑肥拣瘦，霸占黑龙江和云南两地的所有名额，那纯粹是出于个人的私利。为了私利而暴打秉公分配名额的李老师，实在没有任何可以原谅的借口。

我们没法让那些在文革中打人的红卫兵们道歉，陈小鲁能够主动道歉，说明他良知未泯。那位红二代自己不道歉也就罢了，还要说“陈小鲁不像话”，那就缺乏天良了。我只能说一句，“人在做，天在看。”

□ 原载作者新浪博客

~~~~~  
【史海钩沉】

## 清华大学727事件（五）

• 胡鹏池 • 但 燊 •

（上接 z k 1 7 0 6 c）

### ◇ “728谈话”中的“毛泽东之问”

#### 一、“728谈话”中的明显失误

毛泽东说：“……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在“728谈话”中，毛只有这一处提到了“727事件”中的伤亡情况，而且所引用的数字也不准确。更令后世诟病的是三位最高领导人竟极为罕见地运用“彪式语言”，在庙堂之上联袂演出了一段“最小最小最大最大”的“三人转”。

在蒯到会后，毛还有一处提到工宣队：“工人是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打伤工人。”

从韩爱晶的文本看，在“728召见”中，毛及中央高层中没有一个人对死难工人表示哀悼，也没有对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及其家属表示关心与抚慰。相反却吩咐：“蒯大富你没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

对比强烈，反差太大。这是“7 2 8谈话”中的明显失误，当然不仅仅是“失误”。

在7 2 8当天及接下来的日子里，工宣队员们自发地、本能地表达了不满。他们说：“打死人的蒯大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死了人的工宣队却没有受到毛主席接见。”工人们纷纷提出质问：“工人阶级到清华制止武斗到底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工人们不仅用语言表达不满，也用行动表达愤怒。他们将怨气与怒气发泄到团派群众身上。在2 8日及其后几天，工人们看见老团就打，只要是从楼里出来的学生，工人们就将其围住，问是老团还是老四？是老团就揍一顿。有时揍完了才知道是老四，只好说声“对不起”或“误会了”。这样的例子发生过很多起。韩爱晶说：“要不是靠毛泽东的威望维持着，那些工人真会把蒯大富等人打成肉饼。”

毛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失误”，他当时与“五活宝”们谈得颇兴奋，召见结束前又回答了韩爱晶提出的“怪问题”，感觉不错，兴致很高。临走时只是重新走回来吩咐“不要反过来又整蒯大富”，但他似乎忘了工宣队死人的这档子事了，所以没有吩咐什么部门、什么人去负责处理死伤工人人们的善后事宜。

过了几天，最早也许就在当天下午，最晚是在7月31日下午，他意识到了这个失误。这个发现有可能是看工宣队“简报”引起的。

他看到关于工人们不满情绪的报导，包括那些“怪话与牢骚”；他还看到关于“9 0 0 3三条大标语”的报导，意识到又是蒯大富手下的那帮“混小子”在歪曲、利用他的“召见”为自己涂脂抹粉、开脱罪责；意识到自己的谈话中缺少了对工人安抚的内容。于是他在7月31日对刚从清华回来的谢静宜说“看来我是要接见了，我是要接见工、农宣传队，接见他们的代表”，接着又于8月5日向工宣队送芒果。

毛的这些言语与行动，是对工宣队迟到的抚慰，虽然是政治作秀，但也算是纠正失误的具体表现吧！他这样的伟大领袖怎么可能用明确的语言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呢？他只是“送芒果”！现在的芒果满大街都是，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连芒果的名字也没听说过。无知、愚昧与好奇造成了好长一段时间对芒果的拜物闹剧。芒果送到了，意思也到了。工人们的情绪呢？除了死难者的家属之外，则是“给点芒果就灿烂”了。

## 二、“7 2 8谈话”中的“毛泽东之问”

### （一）包含“毛泽东之问”的四段话

在“7 2 8”清晨七点多蒯到场后，毛对蒯反复说了四段话：

1.“你们想想，几万人去（清华），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

2.“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少天，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3. “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4. “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如此密集的四段话表达了他对蒯深深的失望、遗憾与不理解：蒯大富啊蒯大富，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怎么能这样？你这个小王八羔子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原因？什么动机？什么目的？

我们将这一系列疑问称之为：“毛泽东之问”。

对于这样的“毛泽东之问”，在414那里是不存在的。正如高晋占同学所说：414即使用脚思考，也会欢迎工宣队。

对于这样的“毛泽东之问”，在蒯团那里也不存在。他们既不用脚思考也不用脑思考，他们根本就不思考，而是本能地、惯性地反抗工宣队。

对于这样的“毛泽东之问”，在工宣队那里是不是存在呢？在“727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工宣队也没有估计到“414反而欢迎工宣队，团派反而反对工宣队”，但是在经历了“727”的血与火，他们亲身感受了414的理性与人性，亲身领教了蒯大富的残暴与匪性，大多数工人与军人已经不存在这样的疑问了。

对于这样的“毛泽东之问”，只有在毛泽东那里才存在。因为他的极左路线，因为他的官僚主义，因为他的严重脱离实际，因为他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过清华两派，所以他原先的预测与计划落空了。

有的校友说他脉是号对了，方子开错了。其实是脉也没有号得对，方子也是开错了。播下去的是龙种，长出来的是跳蚤。他能不失望吗？

“毛泽东之问”的核心是：大家都没有通知，为什么我不喜欢的414反而欢迎工宣队？而我一向看好的蒯大富却反而用武力对抗工宣队？

由此联想到：蒯大富真蠢！井冈山很蠢！你为什么怎么这样蠢？是偶尔这样蠢，还是一向这样蠢？

由此联想到：414究竟是个什么组织？沈如槐究竟是个什么人？我原以为他们可能不会欢迎工宣队，为什么欢迎的反而是他们？

沈如槐究竟是个什么人？其实，毛泽东的心中是有数的。

414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沈如槐的出身找不出什么毛病。贫农、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在那个动辄讲阶级、讲成份的年代，沈如槐的政治身份比非党员的蒯大富过硬。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早就掌握了，江青、中央文革也是掌握的，毛泽东同样也是掌握的。

所以，毛每次提到蒯大富当校长，都必定会提到沈如槐当副校长；

所以，毛每次批判414的理论家周泉缨，却从来没有批判过414的一把手沈如槐；所以，毛每次提出北大井冈山后面坏人多，却不提414的坏人多。

即使是在1968年4、5月份后，当蒯大富们将沈如槐划入《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一勺烩，声讨“沈—罗反革命集团”的大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刊登“沈—罗反革命集团”材料的“井冈山”报出了一期又一期，用“逼供信”得来文字材料与录音材料上报了一次又一次，毛泽东当然早就看过的，但始终不为所惑，不予理睬，站稳了基本立场。

## （二）沈如槐认为是工宣队解答了“毛泽东之问”

由于“728谈话”并没有在群众中完整传达，所以当年的清华广大师生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毛泽东之问”，但大家都是有感觉的。

团派弟兄们感到，虽然团派在727闯了大祸、犯了大错，但毛主席仍然支持我们这些老团儿，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414弟兄们感到，虽然我们在727的表现如此之好也没多大用，毛主席仍然不支持我们，天大地大没有一块地方是讲理的！

团派的感觉很快消失了，毛主席派来的工宣队表面上“一碗水端平”，实际上再也端不平这一碗水，他们在感情上再也接受不了蒯大富；

四派的感觉也不好，因为毛主席从来没有对414说过一句中听的话。“让四一四欢迎工人”，这叫什么话？一个“让”字，两个“反而”，这几个汉字力透纸背，让人寒彻心肺！

几十年来，沈如槐除2004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外还另有两篇著述：一篇是2006年12月发表的《史实与断语》，另一篇是2007年4月发表的《回忆与思考》，后者与陈楚三合撰，借“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对“四一四思潮”作了系统的回忆、整理与反思。

在《史实与断语》一文中，沈如槐说：

请听毛主席7月28日是怎么说的吧：“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做？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

“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

“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再请听谢富治8月2日是怎么说的吧：“现在工人都说414好，团派不好。因为他们414没打工人，缴枪快，没抓工农宣传队的黑手。”

沈如槐接着说：“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是为了向人们说明：团派和414在1968年7月27日那一天截然不同的表现实在是“出人意料”，出乎工宣队的组织者指挥者之所料，出乎中央文革之所料，特别是大大出乎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料。”

沈如槐结论道：“正是这个‘出人意料’才使得工宣队对清华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有了符合实际的认识，并在毛主席认为414是‘右倾保守组织’的情

况下，改变了毛主席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并最终促使毛主席抛弃蒯大富、抛弃五大领袖。”

“这是解读清华文化革命 7 2 7 之后那段历史的关键之点，也是解读红卫兵运动终结的那段历史的关键之点。”

请注意：沈如槐在这里用了四个“出人意料”。我们也正是由此得到启发，提出在“7 2 8 谈话”中存在着一个“毛泽东之问”。

两者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达方式。

### 三、工宣队如何解答“毛泽东之问”？

#### （一）有没有工宣队的调查研究？

沈如槐认为正是这四个“出人意料”导致工宣队对清华两派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将结果陆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促使了毛泽东对蒯大富所代表的这类极少数极端极左造反派从认识上到感情上发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变化。

那么，工宣队进校后究竟有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呢？

初看起来似乎不可能有。工宣队进校时间仓促，还没有站稳脚跟，制止武斗、收缴武器之类的事情刚开始，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哪有时间做所谓的调查研究呢？

但是，从广义上理解，这样的调查研究不仅是有的，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中。所谓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指工宣队工作进展的日常汇报，以及日常所见所闻的整理、归类、据实汇报。这就是谢静宜的回忆中所提到的：“之后，宣传队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放出被造反派关在生物馆里的大批所谓‘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等等人物。”

其实，工宣队的调查研究难度并不大，蒯大富一伙的罪错朗若白日，俯拾皆是，实在早已经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工宣队一边处理着日常工作，一边随时随地做着这样的调查研究，材料层出不穷。

#### （二）工宣队的汇报内容：三大类

“7 2 7”前，毛泽东对清华文革的了解是多渠道的：中央文革的汇报、江青的耳边风，团派《井冈山》报及两派的小报、简报，市委、市革委、卫戍区的汇报等等。虽然多渠道，但主要是为蒯大富说好话的。

“7 2 7”前后，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对蒯大富都已经极其反感，江青也不敢瞎掺乎，团派原有的汇报渠道无形之中就被掐断了，只有来自工宣队的汇报才是最畅通的，也是毛泽东最关切的。

毛泽东对清华的信息来源突然由多渠道变成了单渠道。

工宣队的汇报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大量的密集的简报；二是小谢的电话汇报与当面汇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小谢的当面汇报。小谢的每次当面汇报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前面提到的7月31日小谢向毛泽东的告谢富治的状，一告一个准。

工宣队的汇报内容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 一、“7·27事件”中的蒯大富们如何“抵抗、还击”工宣队？
- 二、“7·28谈话”后的蒯大富们如何对毛泽东指示阳奉阴违？
- 三、蒯大富们在清华制造的冤案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法西斯暴行。

第一类：7·27中蒯大富们如何对抗工宣队？

其中必然包括：蒯大富是如何将工宣队定性为“杨余傅的黑后台操纵”的；7·27中午回校后召开的临时总部会上的两点决定；在与工宣队谈判中的表现及谈判后的出尔反尔；7·27的几起严重血案：“东区大血案”与“9·0·0·3血案”；整个7·27的死伤人数统计。

其中还可能包括团派主要头头在“7·27事件”中的具体表现及细节：鲍长康如何冒充解放军；刘才堂如何对空鸣枪、拒绝谈判；任传仲如何一人刺伤七名工宣队员等；外地造反派在“7·27事件”中的作用。

我们虽然没有看当年工宣队的“简报”，所以不知道具体内容，但从后来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端倪。

例如，作为工宣队指挥者之一的迟群不久后是这样讲述“7·27”的：

（宣传队）进去以后，我们有个指挥部，找他们两派来谈判。告诉他们，我们工人同志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是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来的，现在找你们两派来谈判。当时他们不谈。开始他们拖延时间，并且造谣说，你们都是受蒙蔽的，你们的后台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杨、余、傅，你们在受一只大黑手操纵着。他们要揪黑手。后来，我们就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后面不是黑手，是一只大红手，你揪吧！（笔者注：“大红手”的说法已经非常明确的透露了这次行动是毛主席支持的）但是他们造谣还是要造的，后来造谣也不起作用了。工人队伍一直往里走，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停止武斗，交出武器，拆除工事，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他们不听，有少数人还是煽动，在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下，污蔑谩骂工人，说你们都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你们是牛鬼蛇神。他们还搞了电网，搞了带刺的铁丝网，上面挂上牌，写上“电网，小心触电”等字样。（笔者注：西校门进来的大路上，电厂及许多据点的门口都有这样的电网与铁丝网）后来他们向工人扔石头，动用长矛、匕首，刺伤了工人。他们把工人抓到屋里去打，工人手里只有两样东西，一件是毛主席像，一件是毛主席语录，别的什么也没有。他们对工人、解放军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把解放军的帽徽、领章撕下来，（笔者注：在明斋、静斋、土建基地都发生了撕解放军帽徽、领章的事。）把工人打伤。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同志也没有还手，还是继续热情宣传。后来，他们向工人队伍开枪，扔手榴弹。有的工人进楼后，他们向楼里扔手榴弹（笔者注：这就是指的十号楼与明斋），所以当时工人是付出了代价的，工人同志和军队同志是有伤亡的。但是工人、解放军坚定不移，牺牲的同志手里还紧紧握着毛主席语录。受了伤的同志流血不止，还是不走，继续在那里宣传。他们说，不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不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坚决不走。当时，天下着大雨，他们来的时候都未带雨衣，就淋在雨里。有的同志来的时候很仓促，小孩子锁在家里，天晚了还未喂奶，他们也不回去。他们说：这些人这样不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不能走，一定要把

“七·三”“七·二四”《布告》宣传落实好。几万人就坚持在那里。那时，连续下了几天大雨，三万多人一直没有撤退、没有动摇，就是在那里宣传毛泽东思想，读着毛主席语录，向红卫兵小将、向学生们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

一小撮阶级敌人，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进行挑动，妄图挑起武斗。当时我们对这种形势做了充分的估计，做充分的准备，（笔者注：这是迟群吹牛皮。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充分估计，也没有充分准备）规定了几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气，不动手。即使到那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工人同志用武力还击他们。（笔者注：这是夸大。工人也不是吃素的。不能说是“没有一个工人”，只能说是“绝大多数工人”。也不能说没有武器就是不用武力，拳打脚踢也是武力。到了下午，少数工人手中也有从学生手中夺过来的长矛，但没有枪和手榴弹。）

.....

当时他们造谣污蔑，耍两面派，7月27日晚达成协议，停止武斗，让工人同志进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当面说的很好，达成协议以后，工人宣传队广播了，他们回去不广播，搞两面派，给工人宣传队造成很大困难。就是这样也没有难倒工人阶级。

当我们举出这段资料，有人会责问：迟群的话你们也信？

对于“四人帮”小爪牙的迟群的言论，哪些话可信，哪些话不可信？必须要有清晰的判断。迟群是坏人，但不等于他的话完全不可信。这段话中虽有夸大、隐匿的成分，但其基本内容是可信的。

第二类：7 2 8后蒯大富们如何歪曲毛泽东谈话？

#### 1、坚持“接见”的说法

在“7 2 8谈话”过程中，并没有明确是“召见”还是“接见”。在“五活宝”整理的材料中仍然写的是“接见”。工宣队员获悉后说“打死人的蒯大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死了人的工宣队却没有受到毛主席接见”，工宣队员的牢骚与不满引起了上面的重视。7 2 8下午，丁国钰分别给“五活宝”打电话说：“你们整理的稿子原来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改成召见，好不好？”五活宝们当然只能说：“好。”

对于这“一字之改”的意义，“五活宝”们都是心知肚明的。韩爱晶说：“我明白，我们是受毛主席批评的，并不是光荣地被接见。”

但是，蒯大富在传达中忽略了这一点，仍然用“接见”的说法。直至7月31日出版的《井冈山》报154期头版标题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无限关怀红卫兵小将，亲切接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同志》。文中说：“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接见中，毛主席询问了‘七二七’事件的经过，并对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对我们清华井冈山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的支持，最大鼓舞，最大鞭策。”同期《井冈山》报《伟大的战略部署》的社论中说：“毛主席亲自接见了英雄的红卫兵代表，……这是红卫兵的最盛大的节日。”

当工宣队在 9 0 0 3 大楼劝告团派武装放下武器、撤出据点时，他们居然说：“毛主席接见蒯大富的时候已经批评你们了，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当工人说是毛主席不是“接见”而是“召见”时，守楼者们说：“完全不对，毛主席是接见了蒯大富。”

## 2、歪曲、拼凑毛主席讲话

蒯大富在传达“7 2 8 谈话”时这样说：“十万工人进清华，4 1 4 高兴，团派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但是召见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话，是蒯用了毛的几句话加上自己的话拼凑而成。这样的传达会造成错觉，毛对自己派出的工宣队是不满的，毛的立场是站在团派一边。

## 3、毛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蒯却放任 9 0 0 3 坚持守楼。

毛泽东在“7 2 8 谈话”中再三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这一点表达得很清楚，谁都能理解。但是在 7 2 8 后，9 0 0 3 的蒯团武装继续加强工事，将 9 0 0 3 的防御工事搞得固若金汤。

## 4、毛不让揪黑手，蒯却继续同意揪黑手。

毛主席说：“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毛泽东关于“黑手”的表态是极为明确的。可是直至 7 月 3 0 日晚上，在蒯大富于北航主持召开了团派的“流亡政府”会议上，有人利令智昏的提出“继续抓黑手”，蒯居然也利令智昏的同意“继续抓黑手”。

## 5、毛主席说要“斗批改”，蒯大富们却要斗“沈一罗反革命集团及其黑后台”

在“7 2 8 讲话”后，蒯大富们表面上不得不表态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了。在《伟大的战略部署》的社论中说“现在我们就是要立即停止武斗，要大搞斗批改。”可是怎样“大搞斗批改”呢？社论接着说：

“特别是要斗倒刘邓陶的反革命地下复仇军，例如在反动派 4 1 4 中隐藏的沈一罗反革命集团及其黑后台，就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危险的敌人。不打倒这种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刘邓的代理人就会重新上台，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那是多名严重的情景啊！”

蒯大富们实际上就是将清华文革引向新的两派斗争。

## 第三类：蒯大富们所犯下了的法西斯罪行

其中必然包括：蒋刘反党集团、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十二人反党集团三大冤案。团派一共设立了多少专案组？非法拘捕了多少人？专案组规模有多大？组织机构如何？如何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后果如何？死了多少人？伤残多少人？刘冰、吕应中、罗征启、饶慰慈、文学宓、贾春旺、楼叙真、张琴心、黄安妮、谢引麟等人的遭遇，刘承娴之死、罗征敷之死等典型案例；学校党委委员、著名的年轻的核物理学家吕应中是如何被逼打成招，居然作出“炸毁 2 0 0 号”的伪供，文学宓、贾春旺如何被拔牙？饶慰慈如何只剩下半拉屁股？刘承娴如何遭受人格污辱？被迫自杀？哪些人自杀了？哪些人自杀未遂？尤其还包括“7 2 7”



后团派如何继续搞逼供信？包括这些“案犯”走出“集中营”时瘦骨嶙峋、伤痕累累、神情麻木的状况。

我们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虽然是主张阶级斗争的，但他也是一贯反对“逼供信”的，也是一贯反对“虐待俘虏”的，一贯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关”的。当载着一桩桩、一件件蒯团血腥罪行的简报飞往毛泽东的书案，铁石心肠的人儿也不可能不动心，毛泽东也不可能不动心，不可能不发怒。不过，他一时半时真是说不出口啊！

迟群在同一讲话中对团派专案组的“逼供信”做了这样的讲述：过去有一派组织，为了把对方搞垮，从对方抓来人以后，搞了一套恶毒的东西，叫他去念，给他录上音。实际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不讲，不念就打。把木头棒子上钉上钉子打。现在我们要回来一个人，只有半个屁股，那半个屁股被打没了。再一个是罚站，罚站5天5夜，把大腿站的上下一般粗。有的用拔牙齿的刑罚，不讲就拔牙齿，拔掉。有的把人给打死，这是犯罪。用这种办法搞的一些人，工宣队进校后，没有一个不翻案的。有的人痛哭流涕说，我当时屈服了，按照他们的要求办了。如果在敌人的法庭上我有办法，顶得住，但是在学生面前我屈服了。

迟群的这段话也是可信的，可惜的是太简略了。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毛对清华发生的大量“逼供信”的直接表态，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对聂元梓的表态中看出他对这类事的基本态度。毛泽东说：“你们说你们是听我的话的，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

正因为有工宣队简报与谢静宜口头汇报，毛的态度逐渐地变化了。变化总是渐进的、积累的，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质变就发生了。

#### 四、蒯大富被抛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陈育延给叶志江的信中说：“这个严重的错误，是他被毛主席抛弃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太不听话了。”

我们认为陈育延的信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的说法也不能算错。但是蒯被抛弃的“重要原因”太多了，“重要原因之一”的说法掩盖了“根本原因”。

我们认为蒯大富被抛弃的根本原因有两条：

第一条：蒯不仅干扰了，而且直接破坏了毛的战略部署。毛部署清华“727行动”的本来目的就是要“捅这个马蜂窝”，现在“马蜂窝”虽然被捅了，但是飞起来这300多只马蜂却咬死了5个人，咬伤了731人。毛泽东怎么可能容忍呢！

第二条：蒯氏政权作恶多端，必然“见光死”。

工宣队进校后，蒯氏政权的那些欺骗性、残暴性，那些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再也包不住了，陆陆续续见光了。

我们相信：对于团派极少数极端极左分子的这些“法西斯暴行”，当年的广大团派群众也都是不知情的，他们一旦知道了真相，也一定会起来反对、抵制、抛弃这些坏家伙。

我们相信：毛泽东本人也不可能容忍这些事。

所以蒯本人和他的蒯氏政权必然“见光死”。

毛泽东最终认识到：蒯大富一类红卫兵思潮的极端极左性，比他自身的“极左”还要更“极左”；毛泽东也最终认识到蒯大富一类红卫兵政权的残暴性，比他所想象的残暴还要更残暴；毛泽东还认识到蒯大富一类的红卫兵造反派对他的战略部署不仅仅是干扰，而且是直接破坏，所以毛泽东必然抛弃蒯大富。

正因为毛泽东陆续掌握了大量材料，思想上才会不断发生变化，才会最终决定抛弃蒯大富，抛弃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红卫兵造反派。

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8年夏秋之际发生的转折是文革的客观规律，既是毛泽东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蒯大富一类的极少数极端极左造反派“自作孽”的必然结果。完全不需要用什么“阴谋论”、“阳谋论”解释，所有用“阴谋论”、“阳谋论”解释都是不合理的、不恰当的，都是没有触及本质的皮毛之论。

清华大学现职教授秦晖先生就是用“阴谋论”来解释“清华727事件”的一位学者。他说：毛“派三万大军进校就是去弹压造反派的，只不过他明显是要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事态、人为地增加三万大军与千余学生发生冲突的机率。”“其实现在看来，毛如果真讲了那句话（指“造反派，真的反了？！”），恐怕也不会是意外惊讶，而是计谋成功后的惊喜语气。”

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在对“清华727事件”的整体认识上，这是我们与秦晖一类专家学者的原则性的分歧。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